

目 录

《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十年回顾·····刘 军 巩 梅 刘庆霖	1
马克思经济思想在中国早期传入及其思想史特征·····顾海良	11
社会、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孙 超	29
20 世纪初进化论视野下的早期社会主义传播·····王 倩	44
中国共产党与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科学话语权的争夺与重构···王 昆	5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矛盾”话语体系的建构···周 慧	81
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及其时代意义研究·····曹得宝 赵 方	101
李大钊对“新文明”的探索与贡献·····孔玺铭 孔新峰	112
大资本与大工业：梁启超经济思想新探·····张 凯	126
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周东娜	140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及其启示·····房静雅	153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儒学渊源·····袁 蓓	170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万仕国	181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祝 薇	207
《共产党》月刊对欧美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陈安杰 黄 宇	218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三维探析·····侯志江	236
《天义》《衡报》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与初步运用·····李应瑞	250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译者的角色转化·····汪 越	264



ii 《马藏》研究（第五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天津的出版与传播…… 刘庆霖	275
《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术简讯	294
编后记	305



《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十年回顾

刘 军 巩 梅 刘庆霖

作为一项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马藏》以文献的系统汇纂与严密整理为抓手，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材料编汇为成体系的文献，从而为传播史、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更为稳固的文献基础。本文在《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简称《马藏》工程）启动十周年之际，力求以学术工程的视角梳理其推进脉络与成果结构，进而从青年学者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层面，总结《马藏》在知识生产机制上的贡献，并对后续工作与研究议程作出展望。



一、《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十年概要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自 2015 年北京大学正式启动《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以来，这一面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经历了从方案构想、体例建设到成果发布与体系化推进的过程。

工程启动之初，北京大学即在组织架构、总体规划和学术目标层面完成关键奠基。这项工程由北京大学牵头实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核心组织单位，整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与学者力量，形成协同推进的基本格局。在 2015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马藏》工程启动工作咨询会议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工程定位、目标与实施路径展开集中论证。顾海良教授在会上系统阐释了工程缘起与学术意义，强调当前学界仍缺乏一部能够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形成、传播与发展的文献总汇，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多语种、多类型文献的整体编纂与学术整理。《马藏》因此被明确定位为“编研并举”的基础性工程，旨在以可靠文本为底座，推动相关研究在材料层面与学理层面同步深化。《光明日报》对《马藏》工程的启动作出了报道，强调《马藏》旨在

以“文献再现”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究、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目标是建成“比较齐备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的总汇”，使中国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与研究的重要中心。

在前期推进阶段，《马藏》工程的工作重心在于文献体系和工作规范的建构。《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围绕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文献的系统搜集与整理，持续推进文献普查、目录建设与原文查找，通过对中文著作、期刊论文、报刊文章及相关广告文本的系统摸排，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早期文献基础目录。尤其重要的是，《马藏》工程在反复讨论与实践逐步确立了以“梳、注、述、评”为核心的编纂体例，明确区分原文呈现、事实性注释、编者说明与学术评价之间的层次，既保证文献的原真性，又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引导。与此同时，《马藏》工程也在出版合作上完成关键落点。2016年8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和科学出版社召开沟通会，围绕选题定位、出版规划与合作方式进行深入讨论，并在一系列对接与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明确由科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双方长期协同推进的工作安排，形成稳定、顺畅的出版协作机制，为后续卷次的连续推出与质量控制提供制度保障。至2016年底，在体例基本定型、出版协作机制逐步稳定的基础上，《马藏》编纂与研究完成首批入藏文献的遴选与整理，形成以清末早期著作、译著为主体的二十余种文本，工程由“准备”阶段转入“攻坚定型”的新阶段。

随着编纂文本成规模推进，自2017年起，《马藏》的文本成果开始进入专家审读阶段，工程由内部整理逐步走向学术共同体的公开检验。

《马藏》编纂与研究先后组织召开多批编纂文本审读专家会议，邀请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对已完成文本进行集中审读，审读内容不仅包括注释准确性、编者说明规范性，也涉及文本选择是否恰当、学术判断是否稳妥等关键问题。通过多轮审读与反复修改，《马藏》在学术规范与质量控制方面不断趋于成熟。与此同时，工程还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的全国普查工作，普查以多条路线并行推进，覆盖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重要文献集藏地，补充了一批此前未被充分利用的文献资源，显著提升了《马藏》收录的完整性，也在实践中检验并完善了既有体例。经过这一阶段的攻坚，工程的编纂标准与流程管理日趋稳固，为成果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藏》第一部前八卷在2018年进入校对与定稿阶段，工程开始由



“在编”转化为可见、可读、可用的学术成果。围绕初校、二校、三校等关键环节,《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和出版社密切协作,对原文录入、注释表述、编者说明与版式规范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逐步形成高度统一的编辑标准;同时,面向第二部等新一批编纂任务,中心开展编纂培训,重点围绕报刊文献的体例规范,对新加入的青年学者进行集中指导,这标志着工程在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层面开始形成制度化通道。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期间,专程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观《马藏》编纂成果展览,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并充分肯定了这项工作的学术价值,称其“非常有意义”。总书记对《马藏》的肯定,不仅极大鼓舞了编纂团队的士气,更使《马藏》工程的学术意义与时代价值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与认可。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并充分肯定《马藏》工作的鼓舞下,《马藏》工程推进节奏明显加快,工作重心也由前期的编纂规范与文本定型,逐步转向成果发布与多部协同推进。2019年5月4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背景下,北京大学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暨《马藏》首发仪式”的形式,面向学界与社会正式发布《马藏》第一部第一至第五卷及《〈马藏〉研究(第一辑)》等成果。《马藏》的首发式既是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以高规格学术研讨回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使《马藏》由此完成从“工程建设”向“公共成果”的关键跨越,并迅速进入学界视野。围绕首批成果面世,《光明日报》在头版的长篇报道中将《马藏》置于“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的问题框架下,强调这一工程既牵动总书记关切,又承载“中国学者矢志为世界贡献属于中国的思想智慧,让中国话语更具影响与力量”的学术使命,并将首发成果视为当代中国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学术成果的“全面、立体呈现”。^①

伴随首发成果的推出,《马藏》工程的研究支撑与资源保障也随之强化:由孙代尧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藏》编纂与研究”,以及由孙熙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藏》早期文献(1871—1921)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继立项,为后续的卷次拓展与多部协同推进提供了更系统、更稳定的项



^① 晋浩天,王斯敏,张胜.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马藏》诞生记[N].光明日报,2019-05-05(1).

目支撑。与此同时，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的编纂工作同步展开，标志着《马藏》由单一板块推进转向多部并行的整体推进格局，工程开始以更清晰的“版块分工—成果衔接—节奏协同”的方式进入稳态运行。

随着《马藏》工程逐渐进入稳定产出期，典籍出版、学术研究与教学转化之间的贯通关系也日益凸显。在出版层面，第一部后续卷次陆续推出，进一步巩固了著作类文献的体系化呈现；在组织运行层面，第二部（报刊文献）、第三部（通讯、档案类文本）与第四部（中共文件类文本）的编纂工作持续推进，使《马藏》逐步具备从“著作体系”扩展到“媒介生态与事件链条”的材料结构。值得强调的是，工程成果开始更自觉地向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转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马藏》工程的阶段性成果，面向研究生开设“《马藏》的文本介绍与学理研究”课程（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研究”，并形成秋季学期常设开课机制），使“编纂—研究—教学”的贯通路径更加清晰，也使《马藏》作为基础工程的学科建设效应得到更直接的体现。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马藏》工程在学术研讨与成果发布层面进一步集中发力：通过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的学术研讨与相关新史料发布，拓展了工程在国际传播史研究中的学术触角；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暨《马藏》出版座谈会”等形式，系统展示第二部、第三部的阶段性成果，并以第一部第六至第八卷的出版与《〈马藏〉研究》辑刊的持续推出，推动“编纂—研究—发表”的良性循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以重要纪念节点为牵引，把典籍出版、史料发现与问题意识的深化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使《马藏》不仅能出成果，还能出议题、出影响。新成果出版后，《光明日报》以“从溪流，汇聚成大潮”概括《马藏》还原早期传播之路的学术旨趣，称其从体量上看“堪称巨著”^①，并强调《马藏》通过追溯原典、梳理传播路径与文本流变，力图在“历史路标”之前的思想世界中寻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曙光，从而为理解其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思想渊源提供更坚实的证据基础。

在稳步推进的同时，《马藏》工程也在不断完善其工作机制与资料保障方式，使大型基础工程的运行更趋常态化、制度化。一方面，《马



^① 韩寒，张胜. 从溪流，汇聚成大潮——《马藏》最新成果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路[N]. 光明日报，2021-03-21（1）.

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组织北京大学相关专业学生志愿者参与文献普查，并逐步探索将其发展为常态化工作，为文献补遗与资料储备提供更扎实的支撑；另一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科学出版社之间的出版协作持续深化，双方在科学出版社召开了《马藏》工作推进会议，对首批出版成果进行系统总结，通报阶段性进展，并围绕第二批成果的出版节奏、卷次安排与协同流程作出部署，从而在“编纂推进—出版节奏—质量把控”之间形成更清晰的统筹机制。伴随这些机制性安排的完善，工程对各部编纂进度、出版节奏与研究方向的统筹协调更为有力，也为后续集成式推出夯实了基础。《人民日报》在综述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development 成就时，将北京大学持续推进《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作为典型例证，强调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底色更加鲜亮”^①，并把《马藏》所体现的系统汇编与持续推进，置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整体叙事之中。



随着《马藏》系统性文献汇编成果的持续推出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在学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回应，并以《马藏》工程为枢纽逐步形成跨校协同、持续运转的学术交流平台。2024年1月6日，北京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马藏》2023年五卷出版座谈会，会议以“两个结合”的问题意识为牵引，把《马藏》阶段性出版成果与学术议题研讨紧密衔接，在总结出版进展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编纂—研究—出版—传播”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2024年6月21日，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究论坛”在嘉兴大学举行，论坛以“研究联盟”的组织方式汇聚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青年研究者，通过主旨报告、分论坛交流等形式，集中讨论早期传播研究的界限划分、核心概念的传译史、文本考证与资料发现等关键议题。2025年6月14日，第三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究论坛”在湖北大学举办，论坛在延续既有议题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传播路径、资料搜集、研究范式与专题研究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通过上述连续性的会议组织与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同盟”已初步成形，并通过常规化的学术研讨

^① 吴月. 努力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就综述[N]. 人民日报, 2022-07-07(4).

会与成果交流机制，持续汇聚研究力量、凝练核心问题、推动资料发现与方法创新，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5年是《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启动十周年的重要节点，10月1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马藏》工程发布了十周年成果，以数据化、结构化方式对十年进展作出总体呈现：截至2025年12月，《马藏》共出版23卷，1500多万字，第一部第一至第十三卷、第二部第一至第七卷、第三部第一至第三卷均已面世，第四部第一至第六卷编纂工作完成；同时，论文集《〈马藏〉研究》已出版4辑，收录论文60余篇。十周年发布不仅是对既有成果的阶段总结，更以“文本体系+研究体系”的整体形态，进一步明确了《马藏》在基础文献供给、学术规范建构与人才梯队培养等方面的综合效应。

至此，《马藏》工程在十年时间内完成了从设想到体系、从规划到成果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具有基础性、标志性意义的重要学术工程。

二、《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十年主要成果与学术贡献

《马藏》以四类文献形态并行推进的方式，逐步建构起支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的系统性文献基础。《马藏》第一部以著作、译著与编述本为主体，呈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理解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问题、进化论与政治经济学等议题的知识谱系；第二部以报刊论文与论说为核心，把相关议题放回《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民报》及《天义》《衡报》等不同立场刊物的公共论说空间，呈现译闻、时评与论战的媒介生态；第三部以时事、通讯与档案性文本为主，提供“事件时序—舆论回声—传播路径”的密集线索，使研究能够在更接近历史现场的材料链条中追踪“何时、何地、如何进入”的具体过程；第四部以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为核心，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与早期发展中的制度化表达和实践化形态，以进一步呈现马克思主义由思想传播、理论阐释走向政治实践和组织实践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马藏》并非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以统一体例与严格规范重建文本可信度。

《马藏》坚持原貌呈现、底本遴选与版本比勘，在必要范围内并收不同译本、不同版本，并标注差异，通过注释、勘误与“编者说明”交代文本流转、概念译名、传播状况与思想倾向，从而把以往研究中常见的讹引、误



读与版本混用风险转化为可核验、可比较的研究对象。与之配套的《〈马藏〉研究》，则把材料发现、编纂经验与问题意识沉淀为可延展的议程，持续推动概念史、翻译史、阅读史等进入早期传播研究，使“文献编纂—学术研究—议题推进”形成相互支撑的成果链条。

在构建文本体系与研究机制的基础上，《马藏》更深层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藏》工程培养了一批深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已形成较为丰厚且风格鲜明的学术产出，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创新发展。在参与《马藏》编纂与研究的过程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学者运用《马藏》的文献成果展开学术研究，已出版2部学术著作，获得3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



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主要展现出以下特点：其一，以文本分析为支点，凝练传播史的理论特征，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机理研究。青年学者把译本、版本、译者群体与刊物媒介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围绕“译者主体性”“互文性/互文本”“译名竞逐与语义漂移”等关键概念展开细读与比勘。如汪越以《社会主义神髓》四个早期中译本的变迁为线索，揭示译者角色由“忠实转述”向“立场化阐释”的转化逻辑；王倩从同一文本不同译本的体例差异与论述重心切入，分析译者的“译者曰”等话语装置如何塑造早期传播的思想取向；裴植等围绕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及其多个中译本展开“互文性”分析，进而讨论文本生成、转呈与传播路径的内在关联。通过此类以版本链、译者链与刊物链为核心的证据组织方式，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入华路径”不再只是外部输入的结果，而是呈现为在转译、编述与再阐释中不断被重构的思想过程。其二，充分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形成从文献分析到学理归纳的研究范式。青年学者并不满足于在思想史框架内“解释文本”，而是主动引入概念史、翻译史、阅读史、出版史与媒介史等方法资源，把传播史置入更具体的制度与媒介条件中。例如，路宽从出版实践与“畅销书”现象切入，揭示社会主义观念在清末民初的流行化机制；又以译者群体研究勾连留学网络、出版机构与受众结构，呈现观念扩散的社会基础；刘庆霖则以清末汉译日书与日文论著译介为切入点，结合译者群体、文本来源与传播语境的细致



考辨，揭示日本渠道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中介机制及其对概念译名与论述方式的塑形作用。此类跨学科方法与《马藏》所提供的多语种、跨体裁的材料结构相互适配，推动传播史研究突破单一学科叙事。其三，更强的时代命题意识与理论关切，使这些研究能够在“历史细部”与“理论阐释”之间建立更稳固的连接。青年学者围绕“两个结合”的历史启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概念生成与语义桥接等议题展开追问，把宏观命题落到切实的文本证据层面。此外，他们也在具体议题上回应学界关切，如李应瑞以《天义》《衡报》为中心讨论译介传播与初步运用，揭示激进刊物在译介、论争与动员之间的机制。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在严密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追求理论化表达，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厚。总的来看，《马藏》正在以工程化的规范训练与稳定的发表机制，把青年学者的文献学功底、问题意识与理论阐释能力贯通起来，使“工程育人”成为传播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马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马藏》既通过高标准的文本整理与资料供给夯实研究根基，也通过规范化的研究训练与学术共同体建设，持续提升学术规范与学理阐释能力，从而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就学科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必须依赖可靠的、成体系的一手文本。若没有经得起校勘、比对与语境还原的材料基础，理论阐释便容易滑向二手转引与概念空转。《马藏》以严格的体例规范，为学科构筑了贯通文本可靠性与学理阐释力的支撑路径。进一步而言，《马藏》在学科建设层面的意义，不止于“提供材料”，还在于以工程化方式推动研究训练与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化运转。工程在组织机制上吸纳思想史、党史、文献学、翻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资源，但这种跨学科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统一标准与流程把不同方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之下。由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不再停留于史料堆积或经验性判断，而更强调证据链基础上的概念界定、机制说明与学理阐释。这种高标准文本底座与规范化研究训练相结合的做法，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质量与表达水准，也为课程建设、教材撰写与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更坚实的学理支撑，使学科的学术规范、学术学理与学术风格在持续实践中得到塑形与巩固。

最后，《马藏》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与方法支点，其作用突出体现在以中国材料为证据基

础、以问题导向推动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马藏》立足于中国历史与学术传统，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所收录的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马藏》的编纂与研究有助于避免我们把理论创新理解为脱离传统与经验的概念拼装。通过对多语种、跨体裁材料的系统整理与严格校勘，《马藏》把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选择的阐释建立在系统、可靠的历史文本之上，使“以中国材料回答重大理论问题”成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马藏》将材料供给与范畴生成、命题提炼紧密联动。它以早期传播过程中的译介、论争、接受与社会反响等材料为基础，推动研究者在文本细读与互证中识别关键概念的中国化轨迹、语义桥接机制与制度嵌入路径，从而把宏观命题落到具体的历史文本层面。以“两个结合”为例，《马藏》所提供的材料结构，使我们能够在历史链条中观察基本原理如何在具体问题情境中被理解、转译与应用，如何在与既有思想资源的互释、融通与再阐释中生成新的表达方式与知识形态。总体而言，《马藏》通过夯实中国材料、提升阐释质量、推动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运转，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方法论支撑与路径示范。



三、总结与展望

十年回望，《马藏》的收获不仅是卷帙浩繁的文本成果，更在于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枢纽，逐步建构起一套持续运转的规范化学术共同体与知识生产机制。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研究团队的长期参与和支持下，《马藏》已把跨校协作从“项目式合作”推进为“共同体式运转”。《马藏》以统一体例、底本遴选与版本比勘为前提，以注释、勘误、编者说明和交叉复核为核心环节，使研究真正回到可检验的文本与语境之中；以持续出版与稳定交流平台为支点，将材料发现、学术讨论、同行评议与成果转化纳入相对固定的流程，从而把个体经验上升为共同体规范。尤为关键的是，这一共同体的规范化运行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机制。青年学者的深度参与，将文献学功底、问题意识与理论阐释能力贯通起来，逐渐形成能够以证据链支撑概念界定、机制说明与学理推导的研究能力结构，使“工程育人”成为《马藏》持续产出与学术创新的重要内生动力。

面向未来，《马藏》仍将坚持既定规划，在四部共同推进的总体格局下，持续完善早期传播文献的系统呈现与学术阐释，同时把既有共同体的规范优势与青年梯队的成长势能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在文本层面，《马藏》将进一步提高“全覆盖、重节点、见脉络”的组织能力，推动不同体裁、不同媒介、不同语种材料之间的互证与贯通；在研究层面，围绕概念史、翻译史、阅读史与传播机制等关键问题，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解释力，推动从材料供给走向范畴建构与理论创新；在平台层面，继续以《〈马藏〉研究》与系列论坛、课程体系为支点，扩大开放共享与协同研究的广度，形成更具国际视野与比较维度的学术对话。《马藏》不仅将持续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文献与研究成果，更有望在共同体规范的支撑下推动研究议程不断深化、理论创新不断累积，使以中国材料回答重大理论问题、支撑学理阐释的路径更加清晰，从而在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规范与话语能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发挥更为深远且持久的作用。

